

新时代全面开放下产业发展的使命和任务

○李天健 刘中显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跟跑者转变为并跑领跑者。面对新形势，我国需要继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提供有效支撑。为此，需要在开放、升级、布局、协同4个方面持续推进，把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以创新引领制造业升级、合理构建制造业空间布局、打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服务业体系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关注的任务和领域，并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对外开放

DOI:10.19709/j.cnki.11-3199/f.2019.11.005

一、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使命

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外开放离不开产业发展所提供的有力支撑，推进全面对外开放将赋予我国产业发展新使命。

（一）新时代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

当前，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全球化受到了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现有产业分工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如果说，新旧动能转换成为了世界经济复苏繁荣的关键，实力对比的更趋平衡成为了国际

力量对比的长期趋势，在曲折中深入发展成为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那么，加快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就成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方向^[1]。

新形势赋予了我国对外开放新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开放的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更重要的是涵盖了创新思维下开放的方式多样、质量提升、布局优化，赋予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新的使命。一是坚持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更好结合，以高水平开放激发深层次结构调整。二是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互动结合，优化区域经济开放布局。三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互动结合，拓展国民经济发展新空间。四是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互动结合，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五是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互动结合，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

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飞跃式增长，同时，“大而不强”的突出问题也愈发明显。背后深刻的原因是我国产业发展还无法有效支撑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具体表现在创新能力弱、核心竞争力不足导致的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不高等方面。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就必须要做到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双轮驱动”转变，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质低价、优进优出转变^[2]。这是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赋予的新使命，也是今后我国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赋予产业发展新使命

新时代，对外开放离不开国内产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持。同时，新时代对外开放，乃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又为我国产业转型提供了方向，赋予了新的使命。

1. 肩负突破产业链低端锁定，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使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表明，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将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似，由于初始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面临着在全球产业链中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更为严峻的是，近些年发达国家的“回归制造业”战略，以及东南亚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从高、低端两个维度对我国的制造业优势形成了巨大冲击。这就对我国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抓住创新发展的新机遇，打破产业链低端锁定，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2.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筑高质量发展战略支撑的使命。当前，我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压制”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增速逐渐下降。要想摆脱这一困境，需要牵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应该说，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已十分明显，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金融、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不断异军突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3. 承载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产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后，仍可以看到其总体质量、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缺乏，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等问题。有鉴于此，未来我国产业发展必然要在产品创新、智能制造等方面做足功课，完成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新使命。

4. 推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使命。客观上，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其中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尤为关键。这就要求在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中，我国产业发展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更高地位，技术和产品创新持续推进，重点领域应用实现突破，技术落地效率进一步提升。

二、高度关注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迅速崛起，在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种类和质量等方面都实现了快速追赶，有力支撑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但是，面对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我国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

(一) 制造业实力显著增强，货物贸易总量高速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不高

2018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 30 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的领先地位。产值方面，我国制造业产值在 2010 年就占到全球比重的近五分之一，并自 2010 年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产能方面，我国制造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由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例如，

我国汽车产量已经连续 9 年蝉联世界第一，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一大批家电通信产品产量也都位居世界首位^[3]。

依托制造业产量的持续增长，我国货物贸易总量高速增长，出口总值已由改革开放初期 1980 年的全球第二十六位，跃升至 2009 年的全球第一并持续至今。按照当年价格，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50 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只有 41.5 亿元，其中出口额 20.2 亿元，到改革开放伊始的 1978 年，两项数据分别增长到 355 亿元和 167.6 亿元。即便这 30 年中的名义年均增长率高达 8%，一般还是认为我国货物贸易在改革开放后才迎来了真正飞跃。1978-2018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 355 亿元增长到 30.51 万亿元，增长 800 多倍，年均增速达 18.4%。

虽然我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出口规模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基于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出口产品仍然存在着产品质量可靠性不足、品种适用性不强、附加值不高，严重制约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根据 OECD 的测算，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约为 68%，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4]。

(二) 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但创新驱动产业发展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传统产业不断优化，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一是传统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破除了大量的无效供给,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以及新工艺的广泛运用提升了传统动能,技术改造投资已成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二是产业结构逐渐迈向中高端。制造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步伐,工业向中高端水平持续迈进,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在201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3.4%、11.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8%和4.7%^[3]。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成长。增加值在2015年至2017年的3年间分别较上年增长10.0%、10.5%和11.0%,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9%、4.5%和4.4个百分点^[3],其中部分产业的规模集聚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四是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重点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取得明显进展,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有力支撑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我国货物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一是贸易方式更趋合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调结构、转方式不断培育对外开放竞争新优势,2012-2017年间,加工贸易占比已经由34.8%下降至29%,而一般贸易占比则由52%上升至56.3%。二是出口产品的结构持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占出口比重在2017年分别为94.8%和5.2%,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从1985年的2%左右提高到2017年的28.8%。

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依旧薄

弱,导致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反过来这又成为了制约我国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屡屡在核心技术上被人卡住脖子,增加了我国产业体系的脆弱性,也降低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话语权。

(三) 服务业擎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但对外开放仍相对滞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领域的大力改革使得服务业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新模式、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服务业已经成为稳定就业和保障财税收入的重要基石和力量。从总量规模看,1978-2018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12.53%,比GDP增速高2.1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也从24.6%上升至52.2%,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从吸纳就业看,服务业已经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2017年底,服务业从业人员几乎占到全部就业人员的半壁江山,比重达到44.9%,高于第二产业16.8个百分点。“双创”的深入实施更是助推服务业新动能蓬勃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得到明显加强。从财税贡献看,服务业已成为我国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服务业在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且增长迅速,从2002年的39.8%上升到2017年的56.3%,其中服务业新增税收占全部新增税收收入的比重在2017年更是达到了54.3%,有力支撑了我国财税收入的稳定增长。从新增市场主体

看,服务业是当前新增市场主体的主要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后服务业各领域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准入不断放开,服务业市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服务业企业当前已经占到新登记注册企业的80%左右。

服务业规模的不断壮大有力支撑了我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务贸易体系,2014年至今我国服务进出口已连续4年排名全球第二。一是服务进出口总量迅速增长。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6.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7918.8亿美元,年均增长15.3%,高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①1.2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主要领域,服务业在2016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中的占比分别达到66.6%和78.5%。二是服务贸易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服务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二十八位已经上升至2017年的第五位,进口由第四十位上升至第二位^[5]。

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的依赖性逐渐加大,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但是,与制造业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仍稍显滞后。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4.6%,比2016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比2016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体系的短板之一。

(四) 服务业部分行业位居

世界前列，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但整体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起步，到以创新为基础提高自身实力，实现走出去战略，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日益提高。

一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我国移动通信技术从2G跟随、3G突破、4G同步，最终到5G引领，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性发展。

二是金融业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显著提升，其增长速度远高于服务业的总体增速。金融业增加值在1979-2017年间实现了年均实际增长12.2%，占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2.1%提高到2017年的7.9%。

三是信息产业在“互联网+”发展战略实施后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192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7452亿元，占GDP比重也由2.2%上升到3.3%，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四是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形成的发展新动能蓬勃发展，已经成为重塑我国经济增长格局的重要力量。2017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7.2%，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比前一年增加131万人，达到716万人，而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总数达到7000万人^②；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在2017年也达到2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3%，占到GDP近三分之一比重，达到32.9%^③。

五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移动支付迅速普及。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在2014-2017年间年均增长29.8%，其中2017年达到29.2万亿元，而2017年使用手机支付的网民规模达5.27亿人，较2012年增加4.72亿人^④，无现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

六是服务分工更趋专业化，商务服务加速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营改增”新一轮税改统一了货物和服务税制，成功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和融合发展，使得商务服务业等得以快速成长^[6]。

服务业转型升级必然带来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服务进出口结构已经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旅行、运输和建筑等传统服务为主向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兴服务为主的重要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我国三大传统服务占比超过70%，其中出口占比78.3%，进口占比64.9%。此后，随着我国金融保险业、文化娱乐业以及信息服务业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新兴服务进出口总额在1982-2017年间实现增长213倍，年均增长达到16.6%，其中出口年均增长实现15.9%，进口年均增长实现16.3%，新兴服务进出口规模在2017年更是达到2161亿美元，新兴服务业中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同比分别增长32.6%、20.1%和21.8%^[5]。

尽管服务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但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相比，发展水平仍显滞后，致使服

务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整体较弱^[7]。

从服务能力和发展水平看，信息技术服务、研发设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业是当前产业发展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迫切需要提质增效升级。此外，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呈现出发展粗放、结构不尽合理、无法有效供应高品质和个性化服务等问题，服务质量、标准化程度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按服务业细分行业看，建筑业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是当前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虽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专利使用权和特许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三、新时代提升对外开放能力的重点任务

针对当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以及全面对外开放的新要求，今后我国产业发展应积极迎接国际竞争，在开放、升级、布局、协同4方面下功夫，推动产业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一)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开拓新一轮产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1. 对外加快推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国际化布局。规范我国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引导企业遵守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遏制恶性竞争事件的发生，同时，政府也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改善和加强信息、法律、领事保护等服务，保障海外人员安全，维护海外企业利益。对内则要有序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积极引导外资进入国内技术实力薄弱的高端制造领域，

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健全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和相关政策法规体系，营造稳定、透明、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政策设计上，一是完善制造业走出去顶层设计，推动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争取与相关国家建设一批境外合作园区。二是积极促进国际产能合作，通过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等方式更高质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体系，加快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带动我国技术、标准、装备、服务真正走出去。

2. 努力打造适应服务业开放新形势的体制机制。继续促进以服务业优化升级带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服务业更高水平的开放筑牢基础；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服务业，有条件的地区应重点发展金融、医疗健康、信息、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

（二）以创新引领升级，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中美经贸摩擦表明，在制造业发展中拥具有核心竞争力十分重要，技术上依靠引进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赢得新一轮全球竞争战略主动。今后，应将以下方面作为重要任务，持续发力。

一是继续坚持和更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系统创新链思想为指导，加快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二是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需求，积极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建成一批高水平制造业创新中心。

三是加强基础应用研究，拓展和加大重大科技项目研究资助范围和力度，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

四是加大投入支持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工艺和材料，促进形成大中小微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实现相互借力、共生共荣。

五是围绕智能绿色制造、新一代信息网络、现代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注重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引领新兴制造业集群发展。

（三）构建制造业合理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提升发展效率

当前，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大量资源在空间上错配的问题不容忽视，如何合理构建制造业空间布局，不仅是关系我国产业发展效率的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而且对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1. 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应在严格遵守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没有条件发展工业的地区不可盲目上马项目，切忌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

2. 推动东部沿海制造业渐次合理转移。首选中西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便利、具有一定基础的地区承接，避免造成承接地“接不住”或以污染换发展的局面。

3. 把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好地结合起来。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和国家

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壮大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领军企业和骨干企业，培育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形成因地制宜、区域联动、特色突出、错位竞争的制造业发展空间布局。

（四）打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服务业体系，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

当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打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服务业体系，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1. 提升服务业支撑能力。围绕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现代供应链、融资租赁、人力资本服务、品牌建设等重点领域，充分激发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能力。

2. 打造服务业公共平台。依托制造业集聚区，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同时，推动创新创业，建立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的众创空间和虚拟创新社区，孵化培育“专精特新”的创新型的小微企业。

3. 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和引导制造业企业除提供制造业产品外，也能提供相关服务，鼓励优势企业加快服务环节专业化分离和外包。

4.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充分重视金融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有序发展金融服务业，加快产品、服务和管理创新。

5. 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鼓励文化、旅游、软件、研发设计、

建筑等服务出口,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共同构成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新优势。

四、建设保障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

(一) 推动企业减负,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综合成本较高是当前制约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今后应继续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把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税费负担作为重要目标。同时,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普惠金融和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用地、用工、用能、用网以及融资和物流成本。

(二) 统筹国内国外,构建现代化对外开放新平台

把握国内国外新形势,构建适合产业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平台。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

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新平台,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其成为新一轮开放的示范区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高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口岸、跨境运输等开放基础设施。以创新信息技术为引领,带动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业态的发展。

(三) 解决融资困难,多手段强化财税金融支持

企业融资难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重要阻碍。实行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税收政策、建立完善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将是推动我国产业完成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应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真正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关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快形成投资来源主体多元、投资

方式多样的投资新机制。逐步发展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吸引和鼓励境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促进产业政策与财税支持、金融服务三方良性互动。

(四) 鼓励创新发展,激发产学研各主体积极性

各级政府应利用相关政策激发各方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积极性,把产学研合作的成效纳入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充分利用分散在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创新资源,集聚和整合各方面技术创新要素,促进形成相应的产学研合作组织。完善产学研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涵盖各方主体的技术信息交流网络,设立链接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加强监管和评估,协助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设立专门规划和项目,在资金上保障产学研合作的顺利实施,完善相关政策和法规,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制度规范和保障。□

注释:

- ① 根据使用美元计价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
- ②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 ③ 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
- ④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三十一次、第四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参考文献:

- [1] 裴长洪,刘洪槐.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8(2):4-19.
- [2] 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7-11-10.
- [3]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改革开放铸就工业辉煌 创新转型做强制造大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六[DB/OL].http://www.stats.gov.cn/zjtj/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4_1620676.html.
- [4] 迟福林.改革开放40年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实践[J].改革,2018(8):35-48.
- [5]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对外经贸跨越发展 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DB/OL].http://www.stats.gov.cn/zjtj/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0_1619861.html.
-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服务业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 擎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DB/OL].http://www.stats.gov.cn/zjtj/ztfx/ggkf40n/201809/t20180910_1621829.html.
- [7] 来有为,陈红娜.以扩大开放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J].管理世界,2017(5):17-27.

【作者信息】李天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中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